

# 略论《汉书》的整体结构

潘定武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汉书》在结构上比《史记》更加注意整体性与规范性,既断代为史,又有鲜明的通史意识,努力将“断”与“通”结合。《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是“大一统”的通识思想在史学上的鲜明体现。《汉书》在整体架构上具有“一部如一篇”的特点,只有将《汉书》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其结构艺术。

**关键词:** 汉书; 结构; 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47X(2008)02-00078-05

李长之先生评价《史记》时曾说:“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sup>[1]218</sup>同样,《汉书》的创作,在班固的心中,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茅坤曾评《翟方进传》曰:“写丞相宣甚器重焉,遥与前篇《薛宣传》呼应。此所谓一部犹如一篇,血脉自相贯注也。”<sup>[2]卷84 翟方进传</sup>但新中国以后,对《汉书》的评价整体陷于低谷,学者论及《汉书》的结构特点,褒扬者多仅有“严谨”二字,而很少有详细分析;贬斥者则称之为“拘谨”,且多归之于班固思想的保守。新时期以来,评价虽有好转,但详论《汉书》结构者仍然未见。

## 一、《汉书》纪传体总体架构

史著是对既往历史的总结,但绝不是对已有材料的简单罗列。面对西汉一代极其丰富复杂的史事,如何理清其序、分门别类,使各类材料杂而不越,构成统一和谐的整体,表达既定的主旨,是摆在班固面前艰巨的任务。

当然,完全继承《史记》的体例结构,对其稍事

修缮,确是一种省事的做法。但在班固看来,这样不但难以体现其严谨的风格,而且更难以充分表达其尊汉与宣扬大一统的主旨。班固杰出的创造精神,体现在《汉书》的体例结构上,即变《史记》五体为纪、表、志、传四体,并精心修饰,使形式更加整齐,史体更加严密,而这又正是作者进一步贯彻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在体制和结构上的表现。然对《汉书》省“世家”而入“列传”,以四体结构全书,历来众说纷纭,赵翼批评曰:“《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通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该为列传。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sup>[3]3-4</sup>确为探本之论,但似未深究《汉书》写作的实际。赵翼本已认识到“班书陈、项俱改为列传,诚万世不易之体”,<sup>[4]96</sup>而未知彪、固父子取消世家之举,不但着眼西汉一代诸侯渐趋衰微的政治大势,而且也使大一统的主题更加集中。因为“世家”一体叙诸侯开国承世,有国别为史的含义,客观上不利于反映国家一统,省此一体,使本纪的纲领与统摄地位更加突出,全书结构更加紧密,行文更加整齐,不但体现了严

收稿日期:2007-11-19

基金项目:2007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书》文学研究”(2007sk308)

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安徽舒城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谨不苟的态度,更将崇扬大汉和宣扬大一统精神推到了极至。为简明起见,现将《汉书》四体内容、功用简单列表如下:

表1 《汉书》四体内容、功用

体例	纪	表	志	传
篇目	十二	八	十	七十
内容	通览大势	谱列要史	分述文化	列叙人事
功用	提纲挈领	纵向通变	横向连贯	悉备本末

无疑,纪因其能提纲挈领,地位最为重要,而表、志意在纵横交错、打通脉络,传则详载一代人事本末。如果说十二纪是《汉书》的骨架,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则是《汉书》的血肉,而它们又都统帅于尊汉、大一统的灵魂。

章学诚曰:“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sup>[97]</sup>《汉书》四体不但经纬分明,“虚实相资,详略互见”,而且相互融贯,处处体现了作者的通识,这在表、志二体中最为突出。《汉书》表的主要功能是纵向疏通,但其表各地异姓、同姓侯王,同样具有横向联络的作用。志的主要功能则在横向贯通各种典章制度,但《汉书》诸志所述,既以西汉一代为主,又注重溯源别流,察古鉴今。二者结合,体现了《汉书》结构的高度一体性和作者非凡的会通精神。

《汉书》七十传列叙了自秦末起义、楚汉相争到王莽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以及四裔民族的历史变迁,不但全面展示了西汉一代历史始末,而且深刻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尤其是热烈赞颂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精神,无情鞭挞了为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的不义行径,充分表达了作者尊汉与维护大一统国家利益的主题。

从内容上看,帝纪集中记载事关国体的大事,反映西汉一代盛衰大势,而将无关国体的内容移入他篇,可谓立西汉历史之主干。表的内容记录侯王功臣概况,既充实了帝纪,又从一个侧面折射西汉王朝的兴衰。十志横向记载西汉各项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学术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大汉的立国之本。七十传中,既详叙人臣之事及四裔历史,又大量补充了帝纪等内容。这种以帝纪为骨干,以表、志、传为支脉血肉的结构与内容安排,使四体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以至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之,读《汉书》与读《史记》一样,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班固也是拿整个《汉书》与我们相见的。

## 二、各体内部的布局照应

### 1. 纪的安排

《汉书》十二纪中,武帝之后为《汉书》新增,惠帝一纪为《史记》所无,而班固所补,吕后虽未称帝,但临朝八年,有帝王之实,班固继承《史记》,《高后纪》予以保留,而惠帝之后二少帝有名无实,平帝之后孺子婴纯为王莽篡位之工具,班氏循名责实,均不为立纪。《汉书》除对吕后作特殊处理之外,严格遵循只为帝王立纪且一帝一纪的原则,使体例更加整齐严密。通过十二纪,将西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前后二百三十年历史大势脉络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汉书》十二纪整体具有提纲挈领的特点,写法上多概叙加白描,少呈现性叙事,更少浓笔渲染。《史通》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sup>[98]</sup>在刘知几看来,本纪应具有纲领一朝国政的意义,《汉书》纪体最符合此标准,因而特受刘氏称赏,《史通·叙事》曰:“《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从班氏对《史记》本纪的改造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二人风格与追求的不同与班固结撰的精心。《高后纪》在承变《吕太后本纪》上堪称典型,班固将吕后迫害戚夫人及赵王、欲鸩齐悼惠王及幽禁少帝等无关朝纲之事尽皆删去,或移入他传,对铲除吕氏之事也只大笔勾勒,而增加了吕后的数道诏令及一些国政大事,与《吕太后本纪》突出人物性格而忽略纲领作用相比,《高后纪》无疑更符合史家规范。《高帝纪》为《汉书》之开篇,也是最能体现班固史学风格的篇章之一,因而它对《史记》的改造尤其值得重视。首先,班氏本着尊汉精神,将刘邦的短处尽量删削或移到他处,其次,作者补充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如灭项羽后大赦天下令、诸侯王上尊号两疏与高帝两让之辞,表明刘邦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又增平赋、求贤等诏,以体现大汉开国规模与非凡气象。总之,此篇叙事丰赡严密,李景星称“《史记·高帝纪》以奇肆胜,《汉书·高帝纪》以庄严胜”。<sup>[99]</sup>《汉书·高帝纪》的意义还在于,它最集中地体现了《汉书》的贯通思想,因而起了统领全书的作用。

## 2. 表的设置

司马迁著通史,创立十表,意在通古今之变。班固创为断代,经过整合,增删,作八表。然据《后汉书》载:“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后世或认为《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全为后续之作,实际以上诸篇班固当已有初稿,“未及竟”为未完成或未定稿之意,而非未创作。《汉书》八表或表异姓侯国兴废,或表同姓诸侯世系,或反映百官变迁,或品列古代人物,亦寓纵向通变之意。

《异姓诸侯王表序》里说:“汉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铸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论于孝文,异姓尽矣。”《诸侯王表序》里则称:“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加,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变,明监戒焉。”可见,《汉书》作表,具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在宣扬大汉一统的宗旨下,强调汉之得天下不仅在于高祖因时乘便,而且是天下诸侯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汉之守天下则不但需要帝王的英明,而且需要同姓诸侯的枝叶相持,惟有枝叶繁茂,刘氏政权的大树才会稳如泰山,一旦枝叶凋零,这棵大树就会枯萎死亡,诚所谓中外一体,本末相依。二是班固试图通过立表打通古今,从一方面体现其通史意识。要之,《汉书》设表与《史记》一样,不仅在提要史事,网罗遗漏,而且欲反映历史盛衰,以“明监戒焉”。

《汉书》八表继承《史记》,而又有创造,《古今人表》则为班固首创,历代意见分歧也最多,或被视为“最不可解者”。因《史记》所无,且其体式特殊,只将自传说中的太昊帝宓戏氏到秦汉之交的项羽、陈胜、吴广等共 1940 人,分列九等之中,而未予评论。前人批评最多者,一方面在其以九等分人,有任情轩轻之嫌,且其中部分历史人物归属明显值得商榷,一方面则在其只表古人,不列汉人,似与《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相违。因而颜师古注《汉书》时为之回护,称其“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或认为此表纯为班昭等人后续。惟何焯与钱大昕之论颇具启发意义,何氏曰:“今人则褒贬具于书

中,虽云总备古今之略要,其实欲人因古以知今也。”<sup>[18]258</sup> 钱氏则称:“余谓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后有作者,继此而表之,虽百世可知也。”<sup>[19]40</sup> 实际此表之设,《表序》里已有明确交待:“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虞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再参考《叙传》“篇章博举,通于上下”之言,可见班氏作《人表》,意在总备古今(实际止于立汉之前)人物,通过列叙其品次以达“显善昭恶,劝戒后人”之目的,而且如前所述,《人表》列人止于汉前,正与纪、传人物相衔,巧妙地显示了《汉书》于叙人物方面的会通意识。

要之,《汉书》各表,在立旨上与全书保持高度一致,在结构上则具有贯穿全书的意义。

## 3. 志的布局

班固著史,自名《汉书》,故易《史记》之“书”为“志”,以避重复。《汉书》共设有律历、礼乐、刑法等十志。

朱东润先生认为:“《史》《汉》之表、志,直为西洋古代史家所不及。表之所及,除繁去滥,简要明洁,其价值已不小,至于书、志所及,骛骛有将当时文化全盘载入之意念,此则西方古代史家所未梦见。”又说:“班书十志,与《史记》八书相关,而不沿袭《史·书》,尤见卓识。”<sup>[10]107</sup> 《汉书》十志中,尤以《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最具创意。《汉书》十志不但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文化典制,而且极具通史意识,前已论及。而十志在宣扬大汉文化之盛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政治制度尤其是礼乐教化方面的不足,如王鸣盛即认为“汉无礼乐”,而“孟坚述西汉二百年,何难实叙,只因汉未尝制礼,乐府俱是郑声,本无可志,不得已只可空论之。”<sup>[11]11</sup> “汉无礼乐而作者在《礼乐志》末所言‘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这其中显然含有希望当时统治者能以古鉴今,修明政治的意义。

## 4. 传的统筹

司马迁曰:“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sup>[12]3319</sup>《汉书》综核名实,省世家人列传,而在设传的宗旨上也与《史记》同中有异。

《史记》立世家、列传,均以本纪为纲,鲜明体现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一统意识。如前所论,《汉书》去世家,只立传,本身更是其崇尚大一统的集中表现。而《史记》立传的重要原则是传主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即重义、重功名。司马迁尚义好奇是古今公认的,而对于功名,他绝非只重其表面,且对功名去就又是相当审慎的。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可见他要坚持儒家大道为人物立传,他更欣赏的是具有爱国精神、维护大一统和忠正仁爱等合乎儒家规范的人物,当然,班固也并非唯儒家人物是选,他的思想本身也有兼取各家的倾向。

《汉书》立传虽为断代体例所限,但也时时注意贯通。卢文弨称:“往往见人讥《汉书》不应为范蠡、子贡、白圭诸人立传,以为失于限断,此说非也。《汉书》中,如《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等传,皆因事立名,并不可分析属于某甲某乙也。自后人妄造目录,冠于本书之前,于是罗列姓名,若一一为之传者。其去取全无一例,遗漏正复不少。《货殖传》可列范蠡、子贡、白圭诸人,《儒林传》之商瞿、桥庇何以不列?田何、杨何亦皆从删?又如《货殖传》中,‘猗顿用盐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只此二语,乃目录大书‘猗顿’,而郭纵则不之及;程郑之下,尚有罗衰,亦复不著。宁成、周阳由,皆酷吏也,乃宁则大书,周阳由则旁注,全然错谬。颜氏注本尚无此,必赵宋始有板印时一妄庸人所为,以便于翻检耳,乃使古人史法亦从而晦。盖因事名篇,则元元本本。”<sup>[13]991-992</sup>

班固本着自己的立传原则,增补了《董仲舒传》、《张骞传》、《李陵传》等。另外,《汉书》对《史记》许多传记内容都作了增删或挪移,无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关于公孙弘、张汤、杜周三人的,《史记》将前者与主父偃合传于《平津侯主父列传》,而后二人入《酷吏列传》;《汉书》则将公孙弘与卜式、儿宽合传,张、杜二人又分别单独设传。其实,张、杜均为司马迁同时代之人,《史记》入之于《酷吏》,确为合理,而班固单独为二人立传,实因看重二人子

孙之德。两相比较,可见善善恶恶同是马、班立传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在班固表现得更为突出。

《汉书》七十传中,按所传人物形式可分单传、合传、类传和民族传(或称四裔传),另有附于主传的附传及自序性质的《叙传》。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附传自有其特色,如《李广苏建传》附《李陵、苏武传》;《杨敞传》附《杨恽传》;《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传》;《韦贤传》附《韦玄成传》;《翟方进传》附《翟义传》等等,较之传主,所附之人往往更是作者所着力刻写的中心。而他所以将张汤、杜周从《酷吏传》中拔出,分别立传,则几乎全是因为二人后代之功。《汉书》的另一类附传,则是于一篇传记中类叙人物,此类亦可视作类传。

《汉书》的民族传既秉承《史记》而来,又大量补充了武帝以后的史料,体现了与司马迁一样对大汉周边民族及其与汉政权关系的重视。而在传体设置和立传主旨上,二书又有所不同。因匈奴的地位及其与西汉的特殊关系,二书均首列《匈奴传》;班固将司马迁之《大宛列传》改作《西域传》,乃因西域各国虽以大宛为首,但实际包含大小五十馀国,故改名;而《汉书》并《史记》之《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等列传,总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似有空间跨度过大之嫌,恐因设传数目之限,不得不如此。总之,《史》《汉》民族传设置长短互见,各有优劣。班固更注重站在维护大一统的角度认识匈奴问题。《史记》将民族传与相关人物传记相交错,客观上更体现了一种民族平等意识;《汉书》则将民族传统一置于类传之末,并对少数民族抱有一定的歧视态度,在思想认识上似乎不如司马迁高明。但无论如何,在我国多民族处于发展融合的早期阶段,司马迁、班固在史著中都以相当的位置和篇幅载录民族历史,其本身就显示了高度的史识,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元后传》与《王莽传》具有终结西汉一代历史的意义,尤其是《王莽传》不但详载西汉政权被新莽取代的经过,而且将深沉的兴亡感慨寓于其中。传末则以“天下悉归汉”;“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的总结性话语,收束前代历史,开启当代历史。又在赞语里与开篇遥相呼应,使全书首尾圆融,主旨突出。

司马迁著史于文末设立《自序》,一方面自叙家世,一方面总括全书。班固继承《史记》,于《汉书》结尾著《叙传》,追叙先祖,展现其家世的发展与特色,

使后代对作者的家学渊源特别是作者接受其父班彪的影响能有较清晰的了解,作者对其作史旨趣的陈述和全书各篇作旨及内容的概要,又从许多方面与正文相互补充,是理解作者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叙传》一篇实起着隐括并引导全书的作用。应当说,在经术统治和谶纬神学弥漫的东汉前期,班固的创作受到了比司马迁更大的限制,但他仍然努力以会通眼光写一代历史,既能体现尊汉和宣扬大一统的意图,又达到借古鉴今、匡正时主的目的。《汉书》总体构思宏大而严整,其结构安排首先体现的是作者的史学思想,突出作者的创作主旨,其次,《汉书》如老将布阵般的构思也为塑造历史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记》在纪传体方面具有首创之功,而《汉书》的四体构书连同其断代为史的体例影响更为深远,直接成为后世正史体例的主流。然而,《汉书》在结构安排上也不无缺陷,一是人物的分合方面存在不够妥帖之处,如将韩安国与窦婴、田蚡、灌夫合传,虽因韩安国与窦、田、灌三人均有较密切关系,但使《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天衣无缝的构思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将蒯通、伍被之事分别从《史记·淮阴侯列传》和《淮南王列传》中剥离出来,与江充、息夫躬合传,班固以四人皆为“利口覆邦家”之辈,虽从史的角度考虑不乏严整,但自文学观之,确实不如《史记》处理之妙。顾炎武批评班固“束于成

格而不得变化”,虽不尽符合事实,但称其另立《蒯通传》和《伍被传》使“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sup>[14]188</sup>是有一定道理的。二是《汉书》在补充了部分重要人物传记的同时,也删略了《史记》的部分人物如医者仓公等传记,流露出作者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眼光似乎不如史公周详。

#### 参考文献:

- [1]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2]凌稚隆.汉书评林[M].光绪甲申重刊本.
- [3]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赵翼.陔馀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
- [7]李景星.四史评议[M].长沙:岳麓书社,1986.
- [8]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0]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1987.
-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卢文弨.二十二史考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14]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曲晓红

## On the Integral Structure of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Pan Dingwu

(School of Ar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yle of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outweighs The Book of History both in integrity and standardization because of the author's combination of the dynastic study and general study and only by viewing it as integrity can we grasp its true structural art.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structure; integrity concept